

一 希望之光

1. 革命落脚大西北

在本世纪 30 年代中期，如果有人能从高空鸟瞰中国大地的话，他将不难看到一幅奇异的图画：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在飞鸟断绝的茫茫草地上，在雪山顶，在大河旁，总有一群衣衫褴褛、扛枪背包的赤足或穿着破烂草鞋的男女，不畏风霜、不避雨雪地向前艰难跋涉着。也许他看不清这群人黄瘦的脏脸，蓬乱的长发，但却一定能够看到，在他们的前后左右，一支支人数庞大、装备精良的军队，远远地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猛扑上去，向这群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男女发起堵击、追击和侧击。在晴朗的日子里，也总有成群的飞机在空中扫射、轰炸，机上青天白日的标记清晰得似乎伸手可摘。然而，就是

这群人，却像一股不可阻遏的红色铁流，蜿蜒曲折地向前倾泻着。它，发端于中国的南方，向西到云贵高原，再北上川甘，在中国大地上画了半个大大的弧线后，最终停在了中国的西北角。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壮歌！

说起长征的发生，我们就不能不描绘一下此前国共两党关系演变的轨迹。在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无疑是两股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最重要的力量。它们的政治主张、政治动向及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自然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进程图，也因此而变得峰谷交错，上下起伏。

1924 年到 1927 年初，国共两党首次合作，迅速掀起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高潮。这是一段令人留恋的美好岁月，虽然并不那么十分理想。随之，因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和分裂行径，阴云又四处笼罩，革命便跌入了低谷。凄风苦雨的 1927 年，既是国共两党分道扬镳的一年，又是希望的种子萌生的一年。在白色恐怖降临之后，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中国共产党人群雄四起，纷纷拿起刀枪武装抗

暴，从而掀起了一场土地革命的红色风暴。

在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过之后，中共中央又在汉口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一年之内，中国共产党在长江南北 13 个省 130 个县的广大地区内，组织发动了 100 多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到处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经过 3 年的浴血奋战，到 1930 年时，中共已在全国建立了大小不等的 15 块革命根据地，红军数量在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自 1927 年 4 月 18 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也忙得焦头烂额：他忙着招降纳叛，忙着纵横捭阖，忙着东征西讨……最终，以中原大战为尾声，他在形式上制服并统一了各派军阀势力。当青天白日旗在中国每一座城市上空哗啦作响的时候，他感到了满足，感到了欣慰。踌躇满志的他，却为“赤匪”势力的崛起而大惊失色，寝食难安。于是，从 1930 年底到次年 7 月，他对红军及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三次大“围剿”。令他难堪的是，数十倍于“赤匪”的堂堂中央精锐之师，却次次以失败而告终。在战争的大海里学习游泳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迅猛发展了自己的势

力，而且积累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军事斗争经验，诸如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原则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探索下，以工农武装割据为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也已逐渐形成，在这条曲折艰辛之路的尽头，将会矗立起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

然而，革命的征途不会一帆风顺。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可是，已经夺取了中共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宗派集团，却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制定了一系列违背客观实际的政策。1931年11月，中共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已被王明集团实际剥夺了对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朱德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这一全国性红色政权的建立，客观上有利于统一领导各个分散的革命根据地，也有利于各根据地与各支红军间的联合、团结与发展。但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潮，却已在

各根据地蔓延、滋长。

从 1932 年 6 月开始，蒋介石又发动了对各根据地的第四次大“围剿”。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先后丧失。中央苏区依赖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正确指挥，则击溃了敌军的进攻，并把苏区扩大到湘赣闽粤 4 省，红一方面军也发展到 10 万人左右，赤卫队员更多达 20 余万。紧接着，蒋介石又在 1933 年的 10 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百万大军和 200 架战机的绝对优势兵力，使蒋介石利令智昏，再加上所谓“步步为营，节节进剿”的堡垒政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方略，使他狂妄地宣称，此举必可彻底“肃清匪患”。

与此相反，中央苏区的 10 万红军的装备完全以轻兵器为主，没有飞机、坦克，就连大炮也十分缺乏，弹药更显不足。更重要的是，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指挥下，红军被迫放弃了行之有效的运动战战术，转而机械地搬用欧式的正规战、阵地战模式，搞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和“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劣势的兵力与敌军拼消耗。苦战一年的结果，苏区的防线全被突破，红军深陷重围之中，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 年 10 月，中央

机关和红一方面军约 8.6 万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yú dū，今于都）踏上了西征之路，预拟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后合组为红二方面军）会合。

在暮色苍茫中，中央红军健儿洒泪与苏区父老乡亲告别。此时，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德籍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却把战略转移搞成了大搬家。庞大而臃肿的西征大军步履迟缓，一再遭到敌军的堵截，损失十分惨重。不得已，原订计划只好放弃，红军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1935 年 1 月，红军攻占了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在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指引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临贵阳，威震昆明。5 月上旬，红军又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接着，红军穿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 6 月份到达川西懋功地区，与从川陕苏区西撤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后，中央红军高举抗日

大旗，于 9 月间继续北上。

甘肃南部的哈达铺，是一个只有两三千居民的小镇。9 月 18 日这一天，红军的先遣侦察连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它，红军战士搜缴的书籍、报纸被特意送到毛泽东住地。自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外界已中断联系了近一年，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肩上压着沉重的担子——他必须为这支队伍确定一个最后的落脚点。接到报纸后，毛泽东的目光近乎贪婪地在字里行间搜寻着。突然，《山西日报》上的一则短讯让他的眼睛发亮了；再读一遍，他禁不住笑了起来。原来，这则国军在陕北“剿匪”的消息，恰恰为他提供了最需要的情报：陕北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块苏维埃根据地，陕北农民领袖刘志丹依然活着。自从离开中央苏区后，红军先是西征，再是北上，除了一个十分模糊的大致方向外，就一直没有也无法确定最后的目的地。现在，毛泽东心中有数了。当天，在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宣布：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经过几天休整后，红军继续北上，于 9 月 27 日占领了榜罗镇和通渭城。在榜罗镇，中

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陕甘支队前去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合，保卫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以此为基地来领导全国革命。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中惟一保存下来的红色区域，它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它们构成了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基础和核心。早在 1927 年 7 月，中共陕西省委即告成立。后来，西北地区的共产党人曾先后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和多次不同规模的农民暴动。在这些起义、暴动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继续发动武装斗争，在 1931 年的下半年，成立了南梁游击队。不久，晋西游击队遭敌军“围剿”，便西渡黄河进入陕北。这两支队伍互相呼应，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力量迅速发展，并于 1932 年 2 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次年 3 月，他们又创立了照金根据地，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这一临时性政权机关。10 月，陕西国民党军队围攻照金，根据地很快失守。在王泰吉、刘志丹领导下，经过 7 个月的艰苦奋斗，在陕北南部又诞生了一块面积达 3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80 万的南梁根据地，并于 1934 年 11 月成立了陕甘

边苏维埃政府委员会。

陕北游击队离开照金地区后，陕北特委又发动农民，重组游击队，在 1934 年 7 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不久，陕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到 1935 年 1 月，陕北已建立了 16 个县的革命政权，以此为基础成立了陕北苏维埃政府。

1935 年 2 月 5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在赤原县周家峪（今属子洲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同年 4~7 月，在刘志丹的领导下，西北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9 月，从鄂豫皖根据地突围的红二十五军，辗转到达陕北。经西北工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徐海东为总指挥（军团长），刘志丹为副总指挥（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正当西北革命形势蒸蒸日上之际，“左”倾肃反的阴风也刮到了这块偏远的根据地内。刘志丹遭到了调查审问，被迫交出了实际指挥

权，随后即被逮捕。陕北一大批军政领导人被莫名其妙地投进了监狱，许多人被枪毙、活埋，含冤而死。这时，敌军乘机大举进攻，地方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西北根据地处于危急之中。

陕西支队离开榜罗镇后，急速向陕北挺进。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上，急调 20 万大军，在西兰公路和六盘山地区匆匆布置了两道封锁线。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10 月 19 日，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受到了苏区军民的热情欢迎和接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了解了陕北肃反的情况后，立即作出三项重要决定：第一，消灭尾随敌军，作为进陕北苏区的见面礼；第二，纠正错误的肃反举动，营救刘志丹等人；第三，与红十五军团主力协同作战，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0 月 21 日，中央红军在吴起镇西部山地设下埋伏，一举歼灭尾追之敌一个骑兵团，击溃两个骑兵团。随即，红军又连续拔掉了两个危害苏区的土匪寨子，安定了苏区边境。11 月初，中央红军到达甘泉象鼻子湾，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在这里，毛泽东对红军的万里长征作了总结，指出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

是播种机，其英雄业绩为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也必将载入史册永垂百世。同时，毛泽东又派王首道、贾拓夫等携带电台，代表中共中央前去瓦窑堡，要求停止肃反活动，停止捕人，停止杀人，立即释放刘志丹等被捕干部。

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会师后，迅速发动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从 11 月 20 日下午到 24 日上午，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两支红军密切协作，奋勇作战，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 5300 余人，缴获迫击炮 8 门，轻机枪 179 挺，长短枪 3500 余支，子弹 22 万多发，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年之后的 10 月 22 日，红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甘肃的静宁、会宁地区，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完成了三军大会师。举世无双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数万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又以陕北为出发地，出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局面。

2. 黄土地上的边区政府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的蚕食鲸吞一

步步加剧，广袤丰腴的东三省自然满足不了这只贪婪成性的侵略恶魔的胃口。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鲁、晋、绥等省亦岌岌可危。泱泱大国的版图在不断变颜失色，日寇独吞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在国势岌岌中，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妥协外交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攘外必先安内”的迷梦也被侵略者的铁蹄踏得粉碎。国难当头，国民党被迫开始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对日问题逐渐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改此前历次会议的“剿共”中心议题，而把“御侮救亡”提到了显著位置。随后，对日外交亦由昔日的妥协退让而渐趋强硬。1936年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作（御侮之限度）的外交报告，重申：“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当我们的领土主权受到损害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对于中共及红军，其政策也由军事“围剿”逐渐转向寻求以“政治方式”来解决。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加快了调整政策

的步伐，以期早日实现国内和平，一展抗日救国的宏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了《八一宣言》中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建议，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随后，中共成功地使红军与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在西北地区实现了大联合。蒋介石在“招抚”、“收编”红军的企图失败后，仍幻想以军事手段剿灭红军。1936年12月4日，他亲临西安督阵，威逼张、杨二将军进攻红军，从而逼出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国共实现再次合作起了巨大作用。1937年2月中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国共关系及对日问题”成了这次大会的主题。会前，中共于2月10日致电大会，提出了实现两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该电指出，国民党如能将如下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即：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则中共将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

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尽管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 2 月 21 日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但其策略却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对日关系方面则表示，“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才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首次提出了准备“抗战”。2~9 月间，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多次谈判，磋商有关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苏区内部开始实施由工农民主制向抗日民主制的转变。早在 1935 年 11 月 2 日，党中央就决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作为陕甘宁苏区的最高政权机关。不久又将陕甘边和陕北两特委改为陕甘和陕北省委，把关中和神府两苏区改为特区，1936 年 6 月则正式设立了陕甘宁省。1937 年 4 月，西北办事处开会，讨论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的问题，为此成立了 4 个专门委员会，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具体转变的问题。 5

月 12 日，西北办事处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开始使用“陕甘宁边区”这一名称。5 月上中旬，党中央在延安又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规定了党在当前的总任务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确立了党在国内和平已实现的新阶段的具体任务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他还特别强调，“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迅速沦陷。8 月 13 日，日寇又在上海兴兵。处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国共合作的步伐也大幅度加快。7 月 15 日，中共代表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项纲领和四项保证。8 月 22 日，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9 月 11 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指挥改称总、副司令），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二九师，全军约 4.5 万人，立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中共代表 7 月 15 日递交的《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如毛泽东所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37 年 9 月 6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特区政府（9 月 20 日称边区政府），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10 月 12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 333 次会议通过决议（未正式公布），承认边区政府，并任命行政长官。11 月 10 日，边区政府发布通令，宣布本政府“俟后统称陕甘宁特区政府，不再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但在次年 1 月，又恢复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边区政府成立后，其组织机构多承袭原西北办事处旧制。最初设执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日常政务由执委会产生的主席团负责。主席团下设有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保安司令部、保安处、高等法院等部门，后来根据需要有所增删，名称不尽相同。

陕甘宁边区的总面积原为 12.9608 万平方

公里，人口约有 200 万。1937 年 7~12 月，经蒋介石承认和南京行政院例会正式通过的边区管辖范围，南起淳化、耀县，北连荒漠，西到甘肃东部，东临黄河，行政区与八路军募补区共计有 26 个县。但在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调集大军，先后占去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豫旺 6 座县城和大片乡村，面积达 3.064 万平方公里，占边区总面积的 24%；人口约 50 万，为边区总人口的 1/4。此后，边区的行政区划屡有变动。1941 年 11 月，边区辖地重新划分为 29 个县、市（计 266 个区，1549 个乡）：

直属县市：延安市、延安县、富县、甘泉、固临（又叫固林，初名红宜，由宜川 4 个区和甘泉 1 个区新建）、延川、安塞、安定、延长、志丹、靖边、神府（神木 5 个区、府谷 1 个区组成）。

三边分区：盐池、定边。

绥德分区：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

关中分区：新正（正宁 1 个区与旬邑 4 个区组成）、新宁（宁县与正宁县的一部分）、赤水（淳化与旬邑的一部分）、淳耀（淳化 3 个区，耀县 2 个区）、同宜耀（同官、宜君、耀